

探寻中国人的多重互依自我：理论、挑战与整合*

李 抗¹ 汪凤炎^{**1,2}

(¹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南京, 210097)

(² 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 南京, 210097)

摘 要 为了全面理解中国人的互依自我内涵, 整理相关文献后, 发现主要有华人本土与跨文化两种研究取向及相关的多种典型理论, 如差序格局理论、华人四元自我理论、道德自我理论、三重自我理论和文化会聚自我理论。这些理论适合解释不同类型的互依自我, 并面临各自的挑战。在意义维持模型下对这些理论及互依自我类型进行了整理, 发现中国人的互依自我是多层次的、动态的。

关键词 互依自我 差序格局 道德自我 三重自我 文化会聚自我

1 引言

马库斯 (Hazel Markus) 和北山 (Shinobu Kitayama) 于 1991 年以来, 主张自我是文化的过程与产物, 提出独立自我、互依自我两个构念, 并对其内涵进行持续修订 (Markus & Kitayama, 1991, 2010)。独立自我构念 (independent construal of the self) 是指把自我作为一种脱离环境的具有独立、自主特征的特异实体。互依自我构念 (interdependent construal of the self) 是指把自我与他人、社会、背景等相联系起来看待。心理学界对独立自我与互依自我这对概念进行了广泛的探索与验证, 曾被认为具有普遍性质的自我, 由此而呈现出多元的文化特征和丰富内涵 (朱滢, 伍锡洪, 2017; Hong & Mallorie, 2004; Kağıtçibasi, 1996; Krahnke, Wanasika, & Kilpatrick, 2012; Park, Uchida, & Kitayama, 2016)。在此背景下, 华人本土心理学对中国人的自我, 尤其是其互依内涵进行了深入探索。他们主张心理学应在社会文化背景中审查人们有关自身的知识观念, 创造一种系统的可被证实的知识体系 (何友晖, 彭泗清, 赵志裕, 2007; Kim, Yang, & Hwang, 2006), 发展一种涵摄文化的心理学 (Tsuda

& Hwang, 2016), 提供说明中国人自我的理论 (杨国枢, 陆洛, 2009; 杨宜音, 2008; Chen et al., 2016; Lu, Kao, Chang, Wu, & Jin, 2008; Spencer-Rodgers, Boucher, Mori, Wang, & Peng, 2009; Sun, 2017)。而跨文化取向的研究在调整了对集体主义的看法后 (LeFebvre & Franke, 2013; Taras et al., 2014), 提出了多重自我理论 (Gaertner et al., 2012; Gore & Cross, 2011; Sedikides, Hoorens, & Dufner, 2015; Smith, 2011) 和文化会聚自我理论 / 混融自我理论 (杨宜音, 2015; 赵志裕, 吴莹, 杨宜音, 2015; Morris, Chiu & Liu, 2015)。在说明中国人的互依自我时, 各取向与理论偏重“互依”的不同内涵, 有个人为中心的、他人取向的、社会取向的、天人合一的。每种理论有其优势又面临挑战, 整理这些理论, 可以更清晰地认识中国人的“我们心理”, 阐明中国社会凝聚力的多重心理机制。

2 本土心理学取向下的互依自我研究

2.1 个人中心型互依自我研究及挑战

费孝通先生于 20 世纪 40 年代提出差序格局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 思想, 奠定了对中国人“个人为中心的互依自我”的说明模型。他认

* 本研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2016 年度重大项目 (16JJD880026) 的资助。

** 通讯作者: 汪凤炎。E-mail: fywangjx8069@163.com

DOI: 10.16719/j.cnki.1671-6981.20190136

为中国人不遵循西方的思维形式,不追求真理与个人权利,而是攀关系讲交情,其人际格局就像石子落水形成的一圈圈的波纹,从自己出发,推延到家人、近亲、远亲、更远的远亲(费孝通,2016)。差序格局是一种内化的心理差序格局,其内涵是在个体为中心的前提下,把周围其他人赋予不同的重要值和意义,拉进自我认同的同心圆中,形成一种具有差序的“个人为中心”的互依自我。

在当下的心理学研究中,差序格局思想得到证实与发展。研究发现,当代中国人拥有“自己人-外人”的心理维度,个体对与自我相关的信息,关系越近精细加工越高。中国人的自我包含母亲成分,母亲是互依自我的组成部分,而西方人的自我不包括母亲(朱滢,伍锡洪,2017)。与传统格局相比,当代差序格局的内容有了变化,表现出多核心状态和关系多样化现象,不仅包括血缘,还包括业缘、学缘、友缘和网络缘等(马伟军,冯睿,席居哲,陈滢滢,梅凌婕,2015;杨宜音,2008)。此外,差序格局的结构层级变得更鲜明,呈现出明显的内外两极分化,外围高度工具化,内核高度情感化,社会支持网络向家庭内核萎缩(徐晓军,2009)。

差序格局理论对个人为中心的互依型自我的说明十分贴切,但中国人的互依自我还有其他类型。虽然费先生认为其思想可以说明包括孔子在内的儒家(费孝通,2016),但这样就存在逻辑上的困境和矛盾(沈毅,2013;王建民,2016)。儒家的“克己”虽然由自己出发,遵循由近及远的差序,但克己成功者的自我边界已经很大,自我中心性很低,表现出了他人或社会取向等。这时,再用差序格局思想来解释,就较为混乱了。而社会取向的互依自我理论提供了与此不同的观点。

2.2 社会取向型互依自我研究及挑战

社会取向的互依自我研究可追溯到许烺光的“情景为中心”的理论。他认为中国人遵从“父子关系”为主轴的伦理传统。中国人注重对权威和长辈的尊重,对自己的压抑,因此,中国人的自我是情景为中心的或社会取向的,而与之相对,美国人的自我是个人为中心的(许烺光,1989)。何友晖受此启发提出中国人的关系自我概念。他认为儒家社会是一个关系支配的社会,在此支配下,个体之间的互惠互依、互动和谐比个体本身更重要,从而中国人的自我是一种承载角色的关系自我(Ho, 1995)。安乐哲对这种思想也很认同,提出了“焦点-场域”

的自我理论。他认为儒家之“人”同时是“焦点”和围绕焦点展开的“场域”,儒家的自我是关于一个人对角色和关系的意识(安乐哲,2016)。

在心理学界,中国人社会取向的互依自我研究以杨国枢(杨国枢,陆洛,2009)的“华人四元自我论”为典型。他认为华人虽然有独立我和互依我两个独立的系统,但以社会取向的互依自我为主。他将社会取向界定为一种高融合性趋势与低自主性趋势的组合。社会取向的自我包含三个次级内容,分别是关系取向、家族取向和他人取向。关系取向包括平行关系与垂直关系,家族取向主要是遵守儒家伦理关系,他人取向是指对一般他人的责任感。中国人在三类相关的生活情景中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这三种方式由学习而得,表现出分殊化与自动化的特征,成为习惯性的社会适应机制。

相关实证研究也证实,中国人的自我同时表现为关系取向、家庭取向和他人取向,其中以他人取向作为显著特征(Sun, 2017)。与独立我相比,中国人的社会取向自我受冲击时对情绪的影响更大,经验到的情绪种类也不同(杨国枢,陆洛,2009)。对包含中国被试的亚洲人进行的研究发现,处在场景中心的亚洲人比北美更显著地从一般他人的视角来展示自我;北美更更多以自我情感来投射认识他人的情感,而亚洲人更倾向于从关系视角来理解他人的情感(Cohen & Gunz, 2002)。并且,中国人的社会取向的互依自我程度越高,其在集体动机上的表现好于在个体动机上的表现,幸福感更高(Jiang & Gore, 2016)。

社会取向相关的理论对中国人在关系取向、家族取向、他人取向上的相关关系缺乏深入讨论,未能充分说明这些次级取向的存在方式是彼此隔离的还是一个整合的系统。同时,与差序格局自我的研究一样,它们均属于现象层次上说明性质的,对于多样化的互依自我形成的内在机制缺乏深入探索,而道德自我理论却注重互依自我形成的内在心理动力机制。

2.3 天人合一型互依自我研究及挑战

道德自我理论(唐君毅,2005)主张个体性的内省自觉,以发现个人与他人、社会、万物休戚与共的联系,以突破小我,实现更大的我,直至产生“天人合一”的终极意义觉悟,达到万物互依的宇宙大我状态。这如《易经·文言传》所言的大人状态,“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

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道德自我的最大实现一直是新老儒家的关注点。现代新儒家群体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中表明了天人合一型互依大我的具体内涵：中国文化能使天人交贯，一方面使天由上彻下以内在于人，一方亦使人由下升上而上通于天。杜维明也持这种观点，认为中国人的自我不仅是个体行为的发端出，还是实现理想社会、宇宙价值的途径（杜维明，2017）。

杨中芳（2009）提出的多层次的道德自我理论延续了这种主张。她认为“自我”在汉语中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自我或小我等于“自身”，以身体为界限。广义的自我或大我包括他人、社会甚至是宇宙万物。从小我到大我的变化是个体通过反躬自省，与社会、宇宙融为一体的去中心化的过程。而由于这种修炼需要一定的智慧，过程漫长艰辛，容易导致自我发展的两面性和分层化（汪凤炎，郑红，2015；徐冰，2003；杨中芳，2009）。两面性是指其私我与公我，真我与伪我的距离很大。分层化是指自我修养愈高其包含的外在内容就愈多，反之，就愈少。

道德自我研究奠基于传统儒家思想，注重个体内在的自省机制，体现出思辨性质的研究特征，来自实证的支持较少。另外，儒家一贯主张差等之爱下的亲亲相隐思想等，这又与天人合一的互依大我内涵相矛盾。道德自我理论唯有吸收现代社会的积极元素，如主体间性、交往理性、对话建构等，才能体现真正的互依大我诉求。

3 跨文化心理学取向下的互依自我研究及挑战

跨文化自我研究与本土心理学，文化心理学等会通后，对自我的研究有了新发展，出现了跨文化解释力更强的理论，如三重自我理论（Brewer & Chen, 2007; Chen et al., 2016; Sedikides et al., 2015）、文化会聚自我/混融自我理论（杨宜音，2015；赵志裕等，2015）等。

三重自我理论主张人类的自我在表征视角分为三个层次：个体自我、关系自我、集体自我。从个体自身独特性的角度表征自我属于个体自我；从“个体-他人”的关系视角表征自我属于关系自我；从内群体与外群体比较视角表征产生集体自我。三重自我理论在国内的研究，其优点是能在中外对比的视角下来认识中国人的自我，所产生的成果与当前

主流心理学联系较为密切。王沛等（2017）发现，中国人在表征自我的早期加工阶段，“家”所代表的关系自我与“国”代表的集体自我占优势，晚期加工阶段个体自我占优势，而国外的研究发现个体自我在早期加工阶段就表现出优势。这说明了中国人互依自我的独特性一面。在关系自我上，血缘相关的人总是包含在中国人的自我概念中。而对于后天交往性的他人，则按照亲密度的关系，被自主地包含或排除在自我边界中（夏瑞雪，2016）。在内隐层面，相对于集体自我，中国人更倾向从关系角度定义自我。在性别上，女性的关系自我要高于集体自我，而男性的两种自我不存在差异（王艇，郑全全，韦庆旺，2017）。汉族的个人自我与关系自我同等重要，集体自我相对最弱，对于藏族，三种自我没有区别（Huang et al., 2014）。对于维吾尔族，其集体自我比个人自我、关系自我更重要（Mamat et al., 2014）。

近年来，以中国学者为主，从文化会聚主义视角下提出了文化会聚自我或混融自我理论（杨宜音，2015；赵志裕等，2015；Morris et al., 2015）。文化会聚视角主张现代性与传统性互相包含，个体不是某一民族的人，而是其所接触的每个民族都留下印迹。会聚自我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机的结合体，是新的自动化的自我构念，是自主与自由的高度统一，是适应文化全球化的整合性和超越性的统一，是以更为博大的心态来整合人类文化。

跨文化取向的自我研究面临的挑战是多方面的。三重自我理论主要是西方学者在其世界观下建构的，他们的世界观与当代中国人的世界观可能大不相同。而世界观深刻影响了人们的自我建构，影响了自我的内涵（Chen et al., 2016）。这暗示了三重自我理论中的“关系”与“集体”等概念在中西文化中的等值性问题需要深入关注。另外，文化会聚自我理论虽对多元文化冲突的解决具有积极启发，但也存在矛盾的地方，有研究发现，死亡提醒会增强人们对固有文化模式的坚持，产生对文化混搭的排斥（Torelli et al., 2011），与生命意义相关的象征性和神圣性的自我认同领域，在文化相遇中容易出现对外来文化的排斥（吴莹，2015）。

4 对多种互依自我的系统性整合

目前，两种取向下的多种自我理论在中国心理学界是彼此并列存在的，各有成果的支撑，这表

现出自我研究领域多样化的学术活力,更充分说明中国人的互依自我是复杂且多样性的。复杂多样性的互依自我存在共同的机制吗?或者说,能否从更大的视角来理解自我的复杂性?有学者从认知视角出发,发现中国人的自我是以矛盾的、变化的方式存在的,与朴素辩证认知(naïve dialecticism)有关(Spencer-Rodgers et al., 2009)。而另外的学者着重个体的意义动力系统对自我的影响(Hermans, 1999),这与哲学家冯友兰(2001)的观点相呼应,后者认为人生存在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等四种意义境界,自然境界者不觉解其自我,功利境界者体验到个体为中心的自我,道德境界者发现了社会自我,而天地境界者发现了天人合一的大我。

基于以上主张,整合认识论和意义论去说明中国人的自我应更具说服力。而意义维持模型(the meaning maintenance model)(Heine, Proulx, & Vohs,

2006)就提供了这种视角。意义维持模型里的“意义”是个体解释自身经历的一种综合的心理表征。一方面,意义是对世界是什么的认识论,个体据此观察和解释事物,并由此建构自我的真实。另一方面,意义是指导自我生命的目的论或价值论。它不仅为个人生活史上的成功经历、悲剧事件提供解释,还在不断的解释过程中逐渐塑造了自我概念(左世江,黄旋雯,王芳,蔡攀,2016)。意义维持模型会通了认识论和价值论,形成了一个具有多层次的意义自我框架。个体由于其对存在的认知和赋意不同,导致其自我定位出现差异。意义的上升标志着新的自我构念的出现,即是说个体可以在更智慧的层面平衡个体与他人、世界的关系。在意义维持模型的视野下可以发现,意义焦点不同,互依自我的类型和水平就不同,如表1所示。

从下往上看,差序格局理论适合解释个人为中心的互依自我,华人四元自我理论和三重自我理论适合解释他人取向与社会取向的互依自我,道德自

表1 意义维持模型与多重互依自我

意义焦点	互依自我类型	相关的自我理论
生命一体相系	天人合一型	道德自我与会聚自我理论
他人、集体	社会取向型	三重自我理论
家人、他人	社会取向型	华人四元自我论
个体	个人中心型	差序格局理论

我理论与文化会聚自我理论适合解释生命一体相系的互依大我。总之,将多种互依自我理论整合到意义维持模型中,可以发现每种理论更适宜的解释水平和其背后的意义内涵,从而对中国人互依自我的认识更具深刻性和立体性。此外,这样的整合还能够发现中国人的互依自我具有多重性和动态性,即是说个人中心型互依可以上升到社会取向型互依及天人合一型互依。

参考文献

- 安乐哲.(2016). 儒家伦理学视域下的“人”论:由此开始慈善.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8(3), 145-158.
- 杜维明.(2017). 儒家论做人(上). *人民教育*, 8, 75-78.
- 费孝通.(2016). *乡土中国·乡土重建*. 北京:群言出版社.
- 冯友兰.(2001). *三松堂全集(第11卷)*.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 何友晖,彭泗清,赵志裕.(2007). *世道人心*.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马伟军,冯睿,席居哲,陈滢滢,梅凌婕.(2015). “差序格局”的心理记忆视角的初步验证. *心理学探新*, 35(6), 514-519.
- 沈毅.(2013). 迈向“场域”脉络下的本土“关系”理论探析. *社会学研究*, 4, 203-228.
- 唐君毅.(2005). *人生之体验续编*.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汪凤炎,郑红.(2015). *中国文化心理学*.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 王建民.(2016). 自我主义与社会秩序——关于“差序格局”的再思考. *社会学评论*, 4(6), 3-19.
- 王沛,陈庆伟,唐晓晨,罗俊龙,谈晨皓,高凡.(2017). 中国人三重自我建构加工中的相对优先性:来自ERP的证据. *心理学报*, 49(8), 1072-1079.
- 王艇,郑全全,韦庆旺.(2017). 中国情境下的关系自我和群体自我区分研究. *心理学探新*, 37(5), 465-470.
- 吴莹.(2015).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夏瑞雪.(2016). *自我边界的结构、功能及神经基础*. 北京:科学出版社.
- 徐冰.(2003). *两面性与真诚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
- 徐晓军.(2009). 内核—外围:传统乡土社会关系结构的变动——以鄂东乡村艾滋病人社会关系重构为例. *社会学研究*, 1, 64-95.
- 许烺光.(1989). *美国人与中国人:两种生活方式比较*. 北京:华夏出版社.
- 杨国枢,陆洛.(2009). *中国人的自我:心理学的分析*.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 杨宜音.(2008). 关系化还是类别化:中国人“我们”概念形成的社会心理

- 机制探讨. *中国社会科学*, 4, 148–159.
- 杨宜音. (2015).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杨中芳. (2009). *如何理解中国人*.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 赵志裕, 吴莹, 杨宜音. (2015).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朱滢, 伍锡洪. (2017). *寻找中国人的自我*.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左世江, 黄旒雯, 王芳, 蔡攀. (2016). 意义维持模型: 理论发展与研究挑战. *心理科学进展*, 24(1), 101–110.
- Brewer, M. B., & Chen, Y. R. (2007). Where (Who) are collectives in collectivism? Toward conceptual clarification of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Psychological Review*, 114(1), 133–151.
- Chen, S. X., Lam, B. C. P., Wu, W. C. H., Ng, J. C. K., Buchtel, E. E., Guan, Y., & Deng, H. (2016). Do people's world views matter? The why and how.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10(5), 743–765.
- Cohen, D., & Gunz, A. (2002). As seen by the other: Perspectives on the self in the memories and emotional perceptions of easterners and westerners. *Psychological Science*, 13(1), 55–59.
- Gaertner, L., Sedikides, C., Luke, M., O'Mara, E. M., Iuzzini, J., Jackson, L. E., et al. (2012). A motivational hierarchy within: Primacy of the individual self, relational self, or collective self?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8(5), 997–1013.
- Gore, J. S., & Cross, S. E. (2011). Defining and measuring self-concept change. *Psychological Studies*, 56(1), 135–141.
- Heine, S. J., Proulx, T., & Vohs, K. D. (2006). The meaning maintenance model: On the coherence of social motivation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10(2), 88–110.
- Hermans, H. J. M. (1999). Self-narrative as meaning construction: The dynamics of self-investigation.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55(10), 1193–1211.
- Ho, D. Y. F. (1995). Selfhood and identity in Confucianism, Taoism, Buddhism, and Hinduism: Contrasts with the west.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 25(2), 115–139.
- Hong, Y. Y., & Mallorie, L. M. (2004). A dynamic constructivist approach to culture: Lessons learned from personality psychology.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38(1), 59–67.
- Huang, W., Mamat, M., Shang, R., Zhang, T. Y., Li, H., Wang, Y., et al. (2014). Analysis of the private, collective, and relational self-cognitions among Han and Tibetan Chinese. *Psychological Reports*, 115(1), 179–198.
- Jiang, T., & Gore, J. S. (2016).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utonomous motivation and goal pursuit: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9(2), 101–111.
- Kağıtçibasi, Ç. (1996). The autonomous-relational self: A new synthesis. *European Psychologist*, 1(3), 180–186.
- Kim, U., Yang, K. S., & Hwang, K. K. (2006). *Indigenous and cultural psychology: Understanding people in context*. New York: Springer Science+Business Media, Inc.
- Krahnke, K., Wanasika, I., & Kilpatrick, J. (2012). Concept of self in the east and the wes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Studies*, 12(1), 97–109.
- LeFebvre, R., & Franke, V. (2013). Culture matters: Individualism vs. collectivism in conflict decision-making. *Societies*, 3(1), 128–146.
- Lu, L., Kao, S. F., Chang, T. T., Wu, H. P., & Jin, Z. (2008). The individual- and social-oriented Chinese bicultural self: A subcultural analysis contrasting mainland Chinese and Taiwanese.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36(3), 337–346.
- Mamat, M., Huang, W., Shang, R., Zhang, T. Y., Li, H., Wang, Y., et al. (2014). Relational self versus collective self.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45(6), 959–970.
- Markus, H. R., & Kitayama, S. (1991). Culture and the self: Implications for cognition, emotion, and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98(2), 224–253.
- Markus, H. R., & Kitayama, S. (2010). Cultures and selves.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5(4), 420–430.
- Morris, M. W., Chiu, C. Y., & Liu, Z. (2015). Polycultural psychology.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66, 631–659.
- Park, J., Uchida, Y., & Kitayama, S. (2016). Cultural variation in implicit independence: An extension of Kitayama et a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51(4), 269–278.
- Sedikides, C., Hoorens, V., & Dufner, M. (2015). Self-enhancing self-presentation: Interpersonal, rela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implications. In F. Guay, D. M. McInerney, R. Craven, & H. W. Marsh (Eds.), *Self-concept, motivation and identity: Underpinning success with research and practice* (pp. 29–55). Charlotte, NC: Information Age Publishing.
- Smith, P. B. (2011).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 on identity. In S. Schwartz, K. Luyckx, & V. Vignoles (Eds.), *Handbook of identity theory and research* (pp. 249–265). New York: Springer.
- Spencer-Rodgers, J., Boucher, H. C., Mori, S. C., Wang, L., & Peng, K. P. (2009). The dialectical self-concept: Contradiction, change, and holism in East Asian cultur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5(1), 29–44.
- Sun, C. R. (2017). An examination of the four-part theory of the Chinese self: The differentiation and relative importance of the different types of social-oriented self.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8, 1–16.
- Taras, V., Sarala, R., Muchinsky, P., Kemmelmeier, M., Singelis, T. M., Avsec, A., et al. (2014). Opposite ends of the same stick? Multi-method test of the dimensionality of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45(2), 213–245.
- Torelli, C. J., Chiu, C. Y., Tam, K. P., Au, A. K. C., & Keh, H. T. (2011). Exclusionary reactions to foreign cultures: Effects of simultaneous exposure to cultures in globalized space.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67(4), 716–742.
- Tsuda, A., & Hwang, K. K. (2016). Editorial: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e-inclusive approaches in psychology. *Japanese Psychological Research*, 58(1), 1–3.

Explore the Chinese Interdependent Selves: Theories, the Challenges and Integration

Li Kang¹, Wang Fengyan^{1,2}

⁽¹⁾School of Psycholog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²⁾Institute of Moral Education Research,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Abstract Hazel Markus and Shinobu Kitayama first proposed that there can be two views of self-construals, namely the independent construal and the interdependent construal. Many scholars recognize that the Chinese are prominently 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 to their western counterparts. Besides theoretical disputes, there are mainly two approaches in studying Chinese 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 One is Chinese indigenous approach; The other is cross-cultural approach.

The Chinese indigenous approach advocates that researchers should base on the principle of "indigenous compatibility" to study self. They construct three typical theories: the theory of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 (DMA), the four-part theory of the Chinese self (FPT), the theory of moral self (TMS). DMA treats individual as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and gives different values to other people associated with the individual. Some studies discover that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attach not only to blood ties, but also to other forms, for instance, classmates, friends, colleagues, etc.

Ideas related to FPT first appeared in 1960s. Hsu argued that the Chinese self is situational or social centered. Inspired by Hsu, Ho regarded the Chinese self as the relational self. At nearly the same time, Yang believed that the social oriented Chinese interdependent self contained three subtypes, that is, relational orientation, family orientation and others orientation. Some scholars who supported TMS had different viewpoints. They advocated that individuals who had the ultimate meaning consciousness under the enlightenment of the Confucian culture could make a new psychological identity of the unity of heaven and man. However, studies supported TMS have mainly stayed at the speculation level or phenomenological description level.

Cross-cultural approach recognizes the tripartite model of self-construal (TMS) and the polycultural self theory (PST). According to TMS, self can be divided into individual self, relational self and collective self based on different levels of representation. Some studies discover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the Westerners in representing themselves at those three levels. For the Chinese, in the early stage of processing, relationship self and collective self are more dominant; In the late processing stage, the individual occupies the advantage of processing. However, the Westerners have always been the dominant individual sel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hree levels of self in Han, Tibetan and Hui Nationalities are compared also. Chiu and Yang created the polycultural self theory (PST), and argued that some people had a new type of self-construct, the polycultural self, to adapt to the complex multicultural environment. Possessing a dynamic structure, the polycultural self was characterized by its hybrid cultural identities and managed multiple cultural identities at the same time.

Those theories concerning 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 can be systematically grasped from the Meaning Maintenance Model. From different views to understand the essence of Chinese selves, DMA is suitable for explaining the individual centered 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 FPT is suitable for social oriented 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 TMS is suitable for explaining the ultimate meaning self in Confucian culture; PST is suitable for explaining the new kind of self-identity emerged in the globalization era. In sum, the Meaning Maintenance Model offers a dynamic multiple perspective to explicate the Chinese interdependent selves.

Key words interdependent self,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 moral self, the tripartite model of self-construal, polycultural self